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大革命的失败

1924—1927年中国大地上兴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经历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大革命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为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制定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策略，到推动国共两党携手领导国民革命；从帮助国民党创立黄埔军校，到为中国革命军队建设提供大量的经费、武器弹药和军事、政治顾问；从要求中国共产党注重自身队伍的建设，到指导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从声援和支持中国的工农运动，到提出武装工农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确实给予了重大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拥有几十万党员的政党，建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在绝大多数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将革命火种遍撒全国，使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大革命高潮，并为大革命失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准备了条件，所有这一切，都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的积极作用分不开。

但大革命终究是失败了。长期以来，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认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一定责任。但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显然是不客观、不公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大量的档案资料证明，不仅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都与莫斯科方面的指导有关，而且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驻华代表在陈独秀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还直接做出了一些错误决策，这些都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下面就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作一追述。

（一）在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退让

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展，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为了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中国的代表，不是积极地对国民党右派开展斗争，而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1925 年 5月初，苏联顾问鲍罗廷到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商讨有关国民党二大的事宜，其中包括在即将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的人数问题。据鲍罗廷在会谈后给加拉罕的电报中称：“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 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一致同意最低限额——4人，其余的根据代表大会期间中国整个局势而定。”①

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1925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1 时，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与孙科、邵元冲、叶楚伧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安排，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会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亦参加。会谈按照孙科等人事前商量好的提纲，讨论了党务、宣传、国共关系以及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等问题。陈独秀等人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离粤等要求，同意停止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击，同意在新的国民党

①参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 年 5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13 页。

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显然，这些意见维经斯基也是同意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突出地表现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

1926 年 3月 20 日，蒋介石借口中山舰有异动，突然制造了旨在打击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时，由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正在广州。布勃诺夫对事件作了全权处理。他虽然认为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但又批评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犯了一些大错误”。他不同意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而是决定向蒋介石让步。

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事实真相并不了解。3 月底，布勃诺夫一行到达上海后，告诉陈独秀，“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①]，故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受布勃诺夫妥协态度的影响，陈独秀认为，革命队伍的分裂只能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有利，蒋介石还是左派，应该维持蒋汪合作的关系。于是，他一面派张国焘前往广州彻底了解事件的真相，一面针对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势力的阴谋，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

4 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陈延年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这才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真正目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央决定：（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为了实现这个计

①《向导》第 148 期，1926 年 4 月 3 日。

划，陈独秀派彭述之赴广州，与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组织特别委员会，与鲍罗廷共同商讨实现这个计划的步骤。但由于鲍罗廷的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落空。

中山舰事件之后，联共（布）领导人担心国共关系有破裂的可能。他们认为蒋介石仍然是国民党左派，因而强调“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为此，他们要求共产党人“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鲍罗廷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从 1926 年 4 月 30 日始，多次与蒋介石进行接触。蒋介石后来回忆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即整理党务案——引者）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①

为了说服共产党人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鲍罗廷多次与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谭平山谈话，并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申述自己的观点。5 月 14 日，鲍罗廷还指示张国焘和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表示中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不会反对整理党务案。

5 月 15—22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由于鲍罗廷事前已做好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的工作，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

整理党务案的被通过，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合法的形式，实现了国民党老右派早就想达到的排斥共产党人的目的，并且使汪蒋合作的局面转变为蒋介石专权的局面，从而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倒退，也为后来国民党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国共合作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①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 年版。

（二）四一二政变前丧失对蒋介石的警惕

当北伐军在两湖和江西取得胜利后，联合战线内部出现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倾向：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是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产生恐怖而日渐向右。为了防止国共合作的破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进一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

中共中央 1926 年 12 月的汉口特别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是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指导下、在不违背莫斯科指示的前提下形成的。在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分化革命队伍的情况和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倾日益分裂的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策略，有些是软弱无力的，有些是不正确的。然而由于报告体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精神，所以在会上得以通过。会议在《政治报告议决案》中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只有防止自己的“左”，才能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能避免“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①]。这次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是自中山舰事件以来一直存在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华政策中的右倾错误的延续。

1926 年 7 月北伐开始后，广州出现了“迎汪复职”的口号。由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各军之间的矛盾，“迎汪复职”很快发展成一场运动。至 8 月，各地国民党组织“请汪销假”的提案纷至沓来。汪精卫也借机致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要求回国，重登政坛。这种情况使蒋介石一时感到极大的压力，他认为迎汪就是要倒蒋。于是派代表找国际代表和陈独秀谈话，希望不要让汪精卫回国。

鲍罗廷虽然认为北伐是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但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7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并不主张立即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受鲍罗廷态度的影响，维经斯基等人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惟一的、最好的途径。然而，蒋介石站稳了脚跟之后，就开始再次向共产党发难，在赣州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到上海后，蒋介石更决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当陈独秀得知这些消息后，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有了警惕。1927 年 3月 25 日晚，陈独秀在上海特委会议上阐发了准备与国民党新右派进行决斗的思想。他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 至于如何同蒋介石决斗，陈独秀非常希望莫斯科能有明确的指示。然而，他得到的指示却是：“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陈独秀当即写信给中共上海区委，指出：“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3月 30 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3 月 31 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莫斯科发电，报告了这一决定。联共（布）领导人收到电报后，立即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给中共中央发电，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

莫斯科方面不允许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据斯大林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蒋介石的反帝作用。 4 月 5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他满有信心地认为，鲍罗廷等人目前还掌握着国民党的实权，完全有能力控制蒋介石。他还说，由于蒋介石领导着反帝军队，所以对蒋介石“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

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9页。

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①。然而，斯大林讲过此话才7天，蒋介石就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三）危急时刻对汪精卫抱有幻想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又将汪精卫等人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1927年5月3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在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决定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发电，要求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领导、组建工农为主的新军、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以惩办和蒋介石有联系的反动军官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月紧急指示”。但莫斯科方面又要求，这些工作应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执行这个指示显然是不可能的。

6月下旬，汪精卫集团急剧右转，并且已公开发出压迫工农运动的通告和训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6月23日会议上，却决定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以期使武汉的经济起死回生，拉住汪精卫。这次会议还决定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汪精卫发去一封电报，“恳请”汪精卫“运用”他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6月24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指出“现在就可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给武汉政府。他认为“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然而，无论莫斯科方面怎样努力，都无法拉住急剧右转的汪精卫。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①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27年4月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

（四)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根本指导思想的偏差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犯了错误，产生了失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远离中国，无法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以及时制定有效的方针政策；没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将苏联革命的经验照搬到中国等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根本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创立这一理论的目的，是在东方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以牵制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进攻，并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共产国际四大发展了这一理论，明确提出建立全世界“反帝统一战线”。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共产国际将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运用到中国时，却将其实用主义化，过多地强调了中国革命反帝的一面，而忽视了与反帝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的反封建的革命。所以，尽管共产国际也提出了一些开展反封建革命的正确原则，但在具体指导中国革命时，则更侧重在中国寻找和扶持反帝力量，过分看重和希望利用国民党及其军队反帝的一面。基于这样的认识，苏联在自己经济并不富足的情况下，仍然拿出一定经费来支援国民党的军事建设，力图在中国培养和训练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武装力量。与此相适应，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虽然也多次指示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右派，但当右派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矛盾可能影响到反帝力量的发展时，他们宁肯要共产党让步，以使右派领导的军队留在反帝联合战线内。后来在大革命危急时刻他们虽然提出建立工农武装，但仍然希望由国民政府领导进行。

由于过分重视和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反帝作用，共产国际要求

千方百计维持国共联合战线。于是，它在反封建问题上不得不向国民党让步。共产国际虽然清楚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所以它提出要尽快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便将农民发动起来，但它又希望土地革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为了使国民党能够接受土地革命纲领并乐于开展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保持联合战线的前提下，制定土地革命纲领，并说服国民政府实行之。在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就必然会受制于联合战线中国民党一方的态度。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必然要触及封建地主的根本利益，这就与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愿望产生了矛盾。所以，从国共合作之日起，是否进行土地革命就成为国共斗争的焦点之一。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但国民政府对开展土地革命并不积极。于是，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国民政府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最终发展为两个极端：一方面农民运动失控，在“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错误口号下，扩大了打击面；一方面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大多数军官对农民运动强烈不满，一些中上层军官开始公开叛乱。国民政府以此为借口，从解决土地问题退到只承认二五减租，最后又退到全面限制农民运动。

依靠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固然是最好的途径，但当国民政府受到军队控制，而军队内的大多数军官又是拥有土地的地主时，依靠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就成为一句空话。马日事变的发生，以及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的急剧右转，以铁的事实证明：在维持国共联合战线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土地革命和联合战线不能两全。

然而，马日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仍然

把解决土地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武汉政府身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其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仍然推行联合战线和土地革命平行的政策：一方面要求必须极力维持联合战线，一方面又严责必须自下而上地开展土地革命。这对于没有武装力量支撑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办不到的。

由于强调中国革命的反帝一面，看重和高估国民党的反帝作用，就要求共产党维持联合战线；为了维持联合战线，就要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向蒋介石、汪精卫等让步。这就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大革命的过程中犯右倾错误的主要根源。正是这些右倾错误，直接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二、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的一场争论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也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29 年红四军七大前后四军党内发生的一场争论，就是围绕如何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展开的。经过这场争论，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得以深化，初步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怎样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怎样建设一支革命军队，怎样开展革命斗争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大突破。

（一）红四军的状况和争论的由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始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奉中央命令改称此名,简称红四军),是 1928 年 5 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师后成立的。从红四军成立到红四军七大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和进军赣南闽西两个阶段。

从 1928 年 5 月到 1929 年 1 月的 8 个月中，红四军转战在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成功地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多次会剿，克服了敌人封锁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极度贫乏。保持了红 军的基本队伍，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坚持了井网山红旗不倒。在开展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红四军领导人十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认真总结经验，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边界党的现状出发，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由于党和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并长期在农村，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由于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也由于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红军还在初创时期，红四军党内对革命怎样搞，党和军队怎样建设缺乏经验，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错误倾向，严重地妨碍着红四军的发展。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在总的路线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认识和解决军内存在的问题上，认识则不尽一致。分歧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一是在根据地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宁冈为大本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坚实基础，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红四军的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缺乏认识，没有深刻理解毛泽东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大意义，因此未能有效地抵制中共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出击湘南的错误指示，造成了井冈山时期最惨痛的“八月失败”，红四军和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二是在党和军队的建设上，毛泽东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四军部分领导人则侧重军事工作，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内军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性和危害认识不足，采取宽容态度；甚至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上述认识上的分歧，在红军初创时期，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因其重要，涉及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能否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心等重大原则问题，因而又是必须解决的。毛泽东曾想解决这些问题，但因戎马倥偬，没能得到及时解决。

1928年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2万余人，在何键的指挥下，分5路向井冈山进攻。为解井冈山之围，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14日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艰苦的转战中，原来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也更加复杂了。

一是在残酷的战争中红四军的成分发生较大变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在下山之初的一个多月中，经历了“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①。因多次遭强敌追击，军事上接连失利，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情绪。部队中原已存在的悲观思想、流寇思想有所抬头，破坏纪律的现象出现了，在党政关系、军队建设、行动方针等方面的分歧也更加突出了。加上部队战斗减员严重，骨干牺牲过多，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水平降低了。而大量未来得及整训的白军俘虏兵的补充，又把许多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带到了红军里来，使部队中已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突出了。

二是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消极影响。4月3日，正在赣南转战的红四军接到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给朱毛并转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来信认为目前革命的主观力量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红四军“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来信还认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②。

①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7页。

中央此信是 2 月上旬写的，应当说对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是正确的，即对当时的红四军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当 4 月四军收到来信时,赣南闽西的局部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大柏地战斗和汀州战斗胜利后,红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已扭转,正欲趁新军阀混战兴起之机推进革命大发展。来信要求四军采取分散游击，调朱、毛离开部队，以隐匿大目标的办法达到保存力量的目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 4 月 5 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朱德及与会其他同志，都不同意中央对形势的估量和要求四军分散行动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了对来信的不同意见，指出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过于悲观，强调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对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意义；阐述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不能离开的理由；总结和汇报了红四军在实践中实行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提出了红四军将利用蒋桂混战，在闽西、赣南 20 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与湘赣边界割据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的计划。实践证明，“四五复信”的上述思想是正确的。

但是，“二月来信”还是在红四军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央对形势的悲观估计与四军党内部分人中存在的悲观情绪是一致的。中央欲调毛泽东去中央，也符合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希望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心理。尤其因为毛泽东的复信明确不同意中央的主张，而给了持不同意见者以攻击毛泽东的口实。

三是红四军领导关系的改变，使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突出了。红四军军委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前委的领导下工作。1928年 4—12 月井冈山时期，军委书记一职最初由前委书记毛

泽东兼任。5月，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兼任特委书记，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11月，红四军开六大，选举朱德为军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新的根据地一时没有建立起来，红军几乎每日行军作战，前委军委机构重叠，不利于应付严峻多变的局面。1929年2月初，前委“遂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①。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应当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在领导人的分工上，也有不尽合适之处。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由过去主管地方工作转为全力以赴处理军中事务。对这种变化，军政主要领导人都不适应，加之职责不明，使原有矛盾进一步发展了。朱德指责毛泽东为“家长制”，妨碍司令部工作，主张按中央决定恢复军委组织。毛泽东则指责对方“久屈欲伸”，“与党争权”。

四是由于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活动，助长了党内纠纷。5月初，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前委除领导军队工作外，又开始实际领导地方工作，工作繁忙头绪多，感到兼顾不过来，遂决定恢复军委。恰在此时，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了四军，前委便决定由他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任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教条主义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散布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主张分散游击。他一上任就主持军委会议作出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要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此外，他作风也不正派，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在干部战士中散布红四军领导中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对中央派，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出现一部分拥护毛泽东，一部分拥护朱德的不正常现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5月底于永定湖雷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红四军党内一场大争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与会者对个人

①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

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恢复正式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设立军委，认为地方工作不多，工作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并批评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此外，与会者还就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原则、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有的同志照搬苏联的一长制，主张“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司令部对外”，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认为政治工作多余，宣传兵是“吃闲饭”① 等等。会上争论激烈，没能统一认识。

会后，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和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各倾向一方，在下面进行非组织活动，做了许多“轻率发言”。刘安恭说四军党内存有派别，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标新立异，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提出采取“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②。林彪则集中攻击朱德，在6月8日白沙前委扩大会议前几小时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希图成立军委是为了摆脱前委领导，是个人领袖欲和虚荣心极端发展的表现，并说朱德惯于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拉拢部下，有一个“无形结合派”，是搞阴谋。他们的言行激化了已有的矛盾，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6月8日毛泽东在白沙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成立军委等问题。朱德在发言中逐条反驳了林彪的意见，提出了主张设立军委的理由。毛泽东在向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中，则认为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与前委分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重要原则，实质上是“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斗争的

① 见《前委通信》第3期，1929年6月。

②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6月22日。

问题’①，表示这个原则问题不解决，他不能在这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由于刘安恭作为军委书记通过决定限制上级党委权力，使前委难以工作，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会议以 36 票赞成、5 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红四军党内的这场大争论虽然是由是否设军委问题引发的，两次前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是军委问题，但实际上涉及是否应当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党及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白沙会议后，争论依然没有解决。6 月 14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系统分析了四军党内存在问题的表现、实质及其产生的原因。他把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问题概括为 14 个方面：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强调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其他问题都是联系于党的领导问题而存在的。他认为四军党内的争论，是两种军事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由于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是从失败的环境中拖出来的。他强调必须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并认真克服错误思想。

综上所述，应当说毛泽东对四军中存在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比较浓厚，加上毛泽东在领导方法上也确有发扬民主不够的缺点，在党内批评上有时过于严厉，因此一时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努力也颇多阻碍。

①毛泽东：《在前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1929 年 6月 8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